

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中的 劳动力流动: 1978 - 2010 年

代 谦 田相辉*

摘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而非公有制部门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规模。本文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部门就业数据,计算了城乡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探讨了所有制结构变迁中的劳动力流动。我们的计算发现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之间的流动与所有制结构变迁一致:(1)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劳动力始终是封闭的,流入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了城镇民营经济部门;(2)乡镇企业的兴衰决定着劳动力向乡镇企业部门的流动;(3)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决定着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释放;(4)城镇民营经济部门和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先后成为国有企业冗员最主要的流向部门。

关键词: 劳动力流动系数 所有制结构 城乡所有制部门

一、引言

对中国劳动力流动问题,各界往往集中讨论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后果、户籍制度与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刘易斯拐点的关系等等,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劳动力流动背后的所有制结构变迁与劳动力流动本身的内在联系。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变迁、经济地理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这种变迁中,以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则是这种演变的核心。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很难从公有制部门内部和政府部门获得发展的资源,而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意味着公有制经济对资源的垄断被打破,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在体制外获得自身发展所必需的经济资源,意味着经济资源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重新配置。进一步说,中国劳动力流动反映了中国所有制改革的变迁,因此对劳动力流动的考察就不能够忽略所有制结构因素,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决定了中国劳动力的基本流向。

如果需要客观科学地评估劳动力流动背后的所有制因素,科学合理地计算劳动力的流动系数是分析的第一步,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部门就业数据,本文逐年计算了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系数,这一计算更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所有制结构变迁对劳动力流动的决定作用。本文将如下安排:第二部分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城乡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分详细介绍了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的内涵及其计算方法;第四部分对测算劳动力流动系数所用的数据、数据处理以及相关假定做了说明;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分别从三个部门和六个部门两个层面,利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企业就业数据进行劳动力流动系数的估

* 代谦,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daiqianecon@yahoo.com.cn;田相辉,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430072,电子信箱:xianghui@whu.edu.cn。

本文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后发优势与经济追赶研究”(编号:08JJD79014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道国制度环境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基于地方市场分割的研究”(项目批准号:70902055)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区域经济分割、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资本积累效率增进: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实证研究”(项目批准号:09YJC790204)的资助,特此感谢。同时感谢匿名审稿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但文责自负。

算,并以此来分析各种所有制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和的发展趋势;最后为结论部分。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们很早就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Lewis,1954;Todaro,1969,1970)。遵循成本-收益分析的思路,Sjaastad(1962)为劳动力流动研究提供了规范的成本-收益均衡分析框架,他把移民看成是一项具有成本和收益的人力资源投资。Todaro(1980)结合自己的就业概率和成本-收益分析的思路,考虑了城乡关系、教育和距离等对信息流的影响,进一步完善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收益均衡分析框架。Lucas(2004)则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新移民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NELM)基于不完全市场理论把移民的研究视角由个体决策转向了集体(家庭)决策,对劳动力流动中的移民风险、流动性限制和不完全信息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Stark and Bloom,1985;Stark and Taylor,1991)。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 NEG)则利用本地市场效应、市场准入以及空间集聚等经济地理因素进一步分析了工资差距在劳动力要素流动中的作用机制(Krugman,1980;Hanson,2005;Fujita et al.,199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一方面具有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一般特点,这些表征能够由经典的人口流动理论来解释(Zhu,2002;Zhao,2003;等等);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和特殊的制度因素始终制约和影响着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这些特有的制度因素使得中国劳动力流动无法直接套用经典理论。在这些制度因素中,户籍制度以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的配套政策最受学者们和政府部门关注。一般来说,理解劳动力流动中的种种制度扭曲是经济学家们理解分析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而体制改革的进展和改革的反复都影响着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和特点(蔡昉,2001)。

束缚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和抑制性的政策,主要是通过以户籍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劳动就业制度、生活资料配给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严密的社会管理网络体系来实现的。这一制度与其他行政分割、城乡分割的制度互为补充,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经济学家们发现不仅户籍制度本身严重阻碍了中国的乡城劳动力流动(邓曲恒、古斯塔夫森,2007),政府的公共品供给、行政边界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也产生了根本性的阻碍作用(夏纪军,2004;Li,2010;等等)。

对于这种分割的一种解释是:城市居民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帮助形成了排斥外地民工的歧视性就业政策,造成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蔡昉,2000)。陈钊和陆铭(2008)也认为城乡分割的经济政策的演变是倾向城市居民利益的决策结果,只有改变这种从城市利益出发、由城市单方面制定人口流动政策的局面,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才能够实现。Zhang(2010)基于微观迁移调查数据,用生存分析计量方法证实了制度性歧视确实导致了移民工作机会的减少,搜寻和失去工作的成本增加。孙文凯等(2011)对2003-2006年期间发生的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进行了检验,通过双差回归方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分析了户改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和流动方向的影响,发现在此期间,很少有证据显示户籍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方面的作用有限,户籍制度改革严重滞后。

虽然现实中劳动力流动的潮流无法阻挡,但近些年来“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使得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问题:人们纷纷猜测“民工荒”的出现是否预示着理论上所说的“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蔡昉(2007)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采取直接观察的方法,做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判断。蔡昉(2010)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结果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认为我国面临人口红利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Knight等(2011)利用2002年和2007年CHIPS(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Series)数据,用刘易斯模型分析了当前极富争议的“民工荒”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的经济现象,认为由于制度原因,这两种现象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共存。而范剑勇和张雁(2009)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认为现阶段中国处于“刘易斯拐点”阶段仅是表面现象,是制度性因素引起的,即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障碍是造成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原因。这一发现意味着,中国前一阶段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仅是一个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滞后。

户籍制度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核心制度之一,内生于中国的制度结构,反映着中国特定的制度结构和制度环境。在所有的制度结构中,所有制结构是所有制度的核心。中国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等制度都受制于所有制结构。劳动力的流动表面上与户籍制度直接相关,反映着产业结构和经济地理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劳动力流动的背后是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变化的核心,其变化包括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两方面的变化。就我国经济改革现实来讲,我国经济体制的一切重要变化,均可以在所有制变化上找到制度性的解释。在所有制结构变化中最为突出的则是非国有经济比重的上升(刘伟、李绍荣,2001),而国有经济本身则改革滞后。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改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演变与升级,从而改善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沈坤荣,1999)。

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可以说,劳动力的流动是所有制结构松动的一种表现:首先,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是中国产业结构发生变动的体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兴起必然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其次,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流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改革的地理分布,沿海省份得改革之先,经济起飞,从中西部省份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最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兴起,沿海省份经济的发展,背后都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劳动力在产业层面和地理上的流动,反映了公有制经济垄断的松动,体现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虽然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劳动力流动背后的所有制问题,如周靖祥和何燕(2009)分析了城镇所有制结构变迁对农村劳动力“吸纳”及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但从总体上来说劳动力流动背后所有制结构的因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所有制结构的层面上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力流动,对我们在制度层面上把握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和现实,重新理解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和经济地理变迁紧密伴随的劳动力流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三、计算方法

本文将构造严格的计算方法,利用现有成系统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中国劳动力在城乡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

假设经济中有 n 个所有制部门,在第 t 年,每个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配置由如下方程决定。

$$\begin{aligned}
 a_{i1}^{t-1}x_{1,t-1} + \dots + a_{i1}^{t-1}x_{i,t-1} + \dots + a_{in}^{t-1}x_{n,t-1} &= x_{it} - \theta_{it} \cdot \Delta L_t \\
 \vdots & \\
 a_{1j}^{t-1}x_{1,t-1} + \dots + a_{1j}^{t-1}x_{j,t-1} + \dots + a_{1j}^{t-1}x_{n,t-1} &= x_{jt} - \theta_{jt} \cdot \Delta L_t \\
 \vdots & \\
 a_{in}^{t-1}x_{1,t-1} + \dots + a_{in}^{t-1}x_{i,t-1} + \dots + a_{nn}^{t-1}x_{n,t-1} &= x_{nt} - \theta_{nt} \cdot \Delta L_t \\
 \text{s. t. } \sum_{j=1}^n a_{ij}^{t-1} &= 1 \quad j \in [1, n]
 \end{aligned} \tag{1}$$

其中 x_{it} 为第 i 个所有制部门 ($i \in [1, n]$) 在第 t 年的劳动力总量, ΔL_t 为第 t 年的劳动力自然增量。

$\theta_{it} = \frac{x_{it} - x_{i,t-1}}{\sum_j x_{j,t-1}}$ 代表第 t 年新增的劳动力分配到第 i 个部门的比例;为计算简便,我们假定这一比例由上一年

劳动力在各部门间的分布比例决定。 a_{ij}^{t-1} 为劳动力流动系数,代表第 $t-1$ 年所有制部门 i 的劳动力在第 t 年流入到所有制部门 j ($j \in [1, n]$) 中的比例,显然 $a_{ij}^{t-1} \in [0, 1]$ 。

方程组(1)横列表明每年所有制部门 j 中的劳动力扣除掉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之后,等于从各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流入之和。例如,方程组(1)第一个方程表明了劳动力从各所有制部门向第 1 所有制部门的流动情况。方程的右边是在扣除掉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之后,所有制部门 1 在第 t 年的劳动力总量。而方程的左边则反映了从各个所有制部门中流入的劳动力,具体来说:由于 $x_{1,t-1}$ 为第 1 所有制部门在第 $t-1$ 年的劳动力, $a_{11}^{t-1}x_{1,t-1}$ 则反映了第 1 所有制部门从 $t-1$ 年到 t 年留在第 1 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而 $a_{i1}^{t-1}x_{i,t-1}$ 代表所有制部门 i 从 $t-1$ 年到 t 年流入到第 1 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而各个所有制部门(从所有制部门 1 到所有制部门 n) 流入到所有制部门 1 的劳动力之和应该等于所有制部门 1 扣除劳动力自然增长之后的劳动力。

方程组(1)的纵列,反映了所有制部门 i 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中的分布。例如,第 1 列反映了所有制部门 1 的劳动力在各所有制部门中的分布情况: $a_{11}^{t-1}x_{1,t-1}$ 表明了 $t-1$ 年所有制部门 1 的劳动力在 t 年有多少分布在所有制部门 1 中,而 $a_{1j}^{t-1}x_{1,t-1}$ 则表明 $t-1$ 年所有制部门 1 的劳动力在 t 年分布在所有制部门 j 中的数量。

很明显,方程组(1)的约束条件 $\sum_{j=1}^n a_{ij}^{t-1} = 1$ ($j \in [1, n]$) 实际上有 n 个。这一约束条件意味着:对于部门 i 的劳动力而言,其在下一年里向其他所有制部门流入劳动力的流入系数之和应该为 1。

方程组(1)及其约束条件是本文的核心方程组。而每年的 a_{ij} 则是我们要求解的系数,它反映了劳动力从所有制部门*i*向所有制部门*j*的流动情况。很明显,当 $a_{ij}^t = 0$ 代表在第*t*年,劳动力并没有从所有制部门*i*流动到所有制部门*j*,而 $a_{ii}^t = 1$ 代表在第*t*年所有制部门*i*的劳动力全部留在本所有制部门,所有制部门*i*并没有劳动力的流出。

对于方程组(1)而言,一共有 $n \times n$ 个未知数, n 个方程, n 个约束条件。在具体的计算中,我们一方面利用直观的劳动力流动信息直接设定 a_{ij}^t 的值为0或为1,以减少我们要求解的未知数的数量。另一方面,我们假定劳动力的流动系数在短时间内保持不变,即劳动力的转移从第*t*-1年到第*t*年和从第*t*年到第*t*+1年间保持不变,这样的假定实际上增加了方程数量。

四、计算细节

(一) 数据说明

我们从2001年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整理了中国1978-2010年劳动力分所有制部门的就业数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劳动力的城乡分布是按照城乡所有制部门划分的,包括城镇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城镇股份合作单位等13个部门,此外根据城镇劳动力和乡村劳动力的余项,我们推算出农业劳动力和城镇其他部门的劳动力水平。我们根据这15项分类各自的性质,按照研究需要,将它们统一分为3类和6类,具体的分类如下:

合并后的部门(3类A)	合并前的部门	合并后的部门(3类B)
农业部门	农业部门①	乡村所有制部门
乡镇企业部门	乡镇企业	
	乡村私营企业	
	乡村个体	
城镇所有制部门	国有单位	城镇公有制部门②
	集体单位	城镇非公有制部门
	股份合作单位	
	联营单位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港澳台商投资单位	
	外商投资单位	
	私营企业	
	个体	
城镇其他部门③		

需要说明的是,三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系数按照不同的标准(第五部分将会详细说明划分的依据)划为两类。其中,三部门A中的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用字母*a*表示,三部门B中的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用

①《中国统计年鉴》在“按城乡分的从业人员”中没有标出农业劳动力,我们根据乡村劳动力与分项乡村所有制部门之间的差额来推算。

②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分类方法为基础进行合并处理。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③在分单位类型统计的就业人数和城镇全部就业人数之间有一个“差额”。这一差额没有在分所有制的劳动力统计中反映出来,我们认为这一“差额”是各式各样的民营经济冲破公有制垄断的产物,蔡昉(2007)称这个差额为“就业余项”,认为这个差额是解释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变化的重要部分,将这一“差额”命名为“城镇其他部门”,将之归于“民营经济”。同样农村劳动力也出现了这一庞大的差额,这一差额实际上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

字母 r 表示,以示区别。

表 2 劳动力就业部门的划分(6 类)

序号	合并后的部门	合并前的部门
1	农业部门(i_1)	农业部门
2	乡镇企业部门(i_2)	乡镇企业 乡村私营企业 乡村个体
3	城镇公有制部门(i_3)	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
4	城镇现代企业部门(i_4)	股份合作单位 联营单位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5	外来投资部门(i_5)	港澳台商投资单位 外商投资单位
6	城镇民营经济部门(i_6)	私营企业 个体 城镇其他部门

表 2 中六个部门后面括号内用字母 i 表示六个所有制部门,六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系数也用字母 a 表示,在第六部分进行相关分析时我们同时标注了是在六个部门的情况下分析。

(二) 先验系数的判定:假定与相关系数

精确测度劳动力流动系数需要大量的约束条件,而现实中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无法满足。根据中国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我们进行如下假定,这样也能够方便计算。

假定一:如果某部门的劳动力在扣除掉自然增长之外还有增加,则认为该部门的劳动力将全部留在该部门,即 $a_{ii}^{t-1} = 1$;该部门还要从其他部门吸纳劳动力。

由于不同的行业对劳动力的要求不尽相同,劳动力在进入新行业的时候,会招致额外的成本。这种成本的存在使得劳动力在进行流动的时候,首先会考虑自己所熟悉的行业。劳动力的这种偏好,导致了这一假定。

假定二:如果扣除自然增量后就业人口比上一年度减少,我们称之为有劳动力流出的部门;为了简化计算,我们假定劳动力流出部门之间没有劳动力流动。 $a_{ij}^{t-1} = a_{ji}^{t-1} = 0, i \neq j$,其中 i 和 j 均为劳动力流出的部门。

假定三:根据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假定城镇所有制部门的劳动力不会流向乡村所有制部门^①。

在具体的计算中,即便使用前面所述的假定,仍然会出现系数过多无法求解的状况。在这一情况下,我们需要借助其他方法对劳动力的流动做事先的判断,此处我们利用城乡六个所有制部门的各年度就业增量减去自然增量后的净增量为基础,计算六个部门的就业相关系数,根据部门间统计显著性,来判断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方向。我们认定,如果部门间的相关系数高度负相关,并且在统计上显著,那么就可以判定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在具体的计算过程中,我们以显著性水平的相对高低为标准。

全部样本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如表 3 所示:与农业部门显著负相关的部门有乡镇企业部门和外来投资部门;与城镇公有制部门显著负相关的部门有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和城镇民营经济部门。需要强调的是,城镇民营经济部门与农业部门的相关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样我们在统计上并不认为城镇民营经济部门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基于我国城乡所有制改革的阶段特征,本文将 1978 - 2010 年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考察部门间的相关系数。第一阶段(1978 - 1987 年)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所有制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如表 4 所示),而第二阶段(1988 - 2010 年)则以逐步深入进行城镇所有制结构改革为主要特征(如表 5 所示)。

^①对于在我国转型期少数几个年份出现的劳动力从城镇大规模回流到农村的特殊经济现象,在实际计算中以异常值来处理,此时,农业劳动力不会再流向城镇所有制部门,即 $a_{11} = 1, a_{1i} = 0, i \neq 1$ 。

通过两个阶段的相关系数表格,我们发现乡镇企业部门在两个阶段一直是吸纳农业劳动力的主要部门,而城镇民营经济部门也一直是吸纳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主要部门。

表 3 全部样本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

所有制部门	i_1	i_2	i_3	i_4	i_5	i_6
i_1	1.0000					
i_2	-0.8246* (0.0000)	1.0000				
i_3	-0.2026 (0.2660)	0.3191 (0.0750)	1.0000			
i_4	-0.3115 (0.0827)	-0.0999 (0.5865)	-0.5503* (0.0011)	1.0000		
i_5	-0.5181* (0.0024)	0.1757 (0.3362)	0.1416 (0.4396)	0.4481* (0.0101)	1.0000	
i_6	0.0089 (0.9613)	-0.3400 (0.0569)	-0.9116* (0.0000)	0.6828* (0.0000)	0.0659 (0.7199)	1.0000

注:括号内为 P 值;* 表示在显著水平 0.05 上统计显著。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 年、2011 年)中的城乡就业数据计算所得。

表 4 第一阶段样本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

所有制部门	i_1	i_2	i_3	i_4	i_5	i_6
i_1	1.0000					
i_2	-0.9918* (0.0000)	1.0000				
i_3	0.3524 (0.3523)	-0.4668 (0.2052)	1.0000			
i_4	-0.5926 (0.0927)	0.5646 (0.1132)	-0.0425 (0.9136)	1.0000		
i_5	-0.4286 (0.2498)	0.4172 (0.2639)	-0.0526 (0.8931)	0.5452 (0.1290)	1.0000	
i_6	-0.6059 (0.0837)	0.6547* (0.0557)	-0.7143* (0.0306)	0.0532 (0.8919)	-0.0583 (0.8816)	1.0000

注:括号内为 P 值;* 表示在显著水平 0.05 上统计显著。

数据来源:同表 3。

表 5 第二阶段样本数据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

所有制部门	i_1	i_2	i_3	i_4	i_5	i_6
i_1	1.0000					
i_2	-0.8159* (0.0000)	1.0000				
i_3	-0.3639 (0.0805)	0.4135* (0.0446)	1.0000			
i_4	-0.2781 (0.1883)	-0.0960 (0.6554)	-0.4743* (0.0192)	1.0000		
i_5	-0.5696* (0.0037)	0.3209 (0.1263)	0.3880 (0.0610)	0.2811 (0.1834)	1.0000	
i_6	0.1504 (0.4830)	-0.4297* (0.0361)	-0.9088* (0.0000)	0.5953* (0.0021)	-0.2291 (0.2815)	1.0000

注:括号内为 P 值;* 表示在显著水平 0.05 上统计显著。

数据来源:同表 3。

五、三部门计算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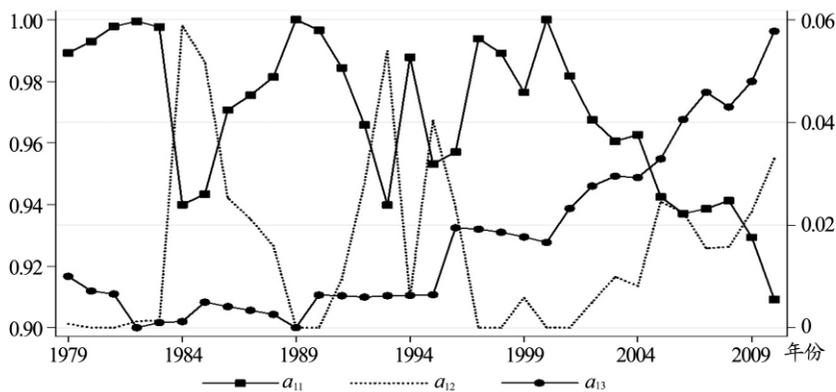
我们在这里重点分析劳动力主要流出部门:农业部门和城镇公有制部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流出反映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的特点;而城镇公有制部门劳动力的流出则重点反映出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我们从乡村所有制部门和城镇公有制部门两个角度讨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

(一) 农村所有制结构调整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起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突破了农村单一的集体经济所有制结构,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一方面是发展中

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具体来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建立,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释放了农业生产力,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基于市场理性开始转向非农生产。基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现实背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主要有“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式的就地转移和“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式的城市化转移。其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方向是乡镇企业、乡村私营企业和乡村个体企业。为了有效刻画这两种转移途径,我们依据方程组(1)构建农业部门、乡镇企业部门和城镇所有制部门三个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方程组(表1 三部门A)。

图1说明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和途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乡村和城镇所有制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情况。(1)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和21世纪10年代中期出现了劳动力流动的高峰;进入21世纪以来,从劳动力流动系数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显现出加速转移的趋势,每年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2)总体上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村和城镇所有制部门的占比趋势都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但前者波动的幅度明显大于后者。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2001年之后,两条曲线基本上保持平行增长的态势。(3)中国的乡镇企业部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乡镇企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但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不断减弱(农业部课题组2000;于立、姜春海2003)。^①(4)乡镇企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减弱后,城镇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开始加强,并超越乡镇企业部门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我们不禁想问,到底是哪些城市部门吸纳了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



说明:(1) a_{ij} 代表所有制部门*i*到所有制部门*j*的劳动力流动系数,以下同;(2)左纵轴表示农业部门劳动力留在本部门的流动系数(a_{11}),右纵轴为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乡村所有制部门的流动系数(a_{12})和转移到城镇所有制部门的流动系数(a_{13})。

数据来源:同表3。

图1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村和城镇所有制部门的占比趋势(部门划分:三部门A)

(二) 城镇所有制结构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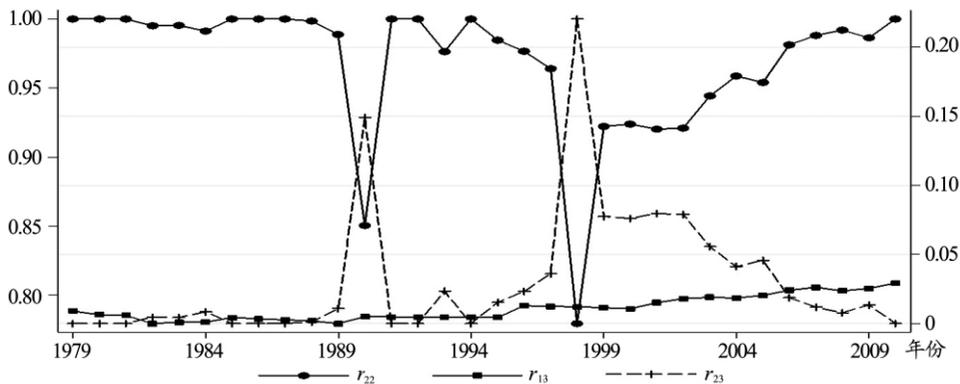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改革的主要阵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其中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制是城镇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重点。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城镇国有和集体所有制部门的大量冗员被释放出来,城镇公有制部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流出部门。城镇一方面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城镇公有制部门又有大量的冗员需要释放。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流出是城镇所有制结构变革的体现。

毋庸置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成为吸纳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最重要的部门。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的同时,城镇内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使得劳动力从城镇公有制部门流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据此,我们依据表1中三部门B划分标准构造了乡村所有制部门、城镇公有制部门和城镇非公有制部门三个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方程组。

同样,我们根据假定计算出相关的劳动力流动系数值,如图2所示。(1)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是城镇公有

^①自2001年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乡村所有制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的能力却一直在增长。钟宁桦(2011)基于1987年到2008年28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乡镇企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不断增长,而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却在递减,这也侧面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依然顽固。这与文献综述部分相关学者的研究发现相一致(蔡昉,2001;陈钊、陆铭,2008)。

制部门劳动力流动最主要的吸纳部门, 城镇公有制部门转移到城镇非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占比 r_{23} 和留在本部门的占比 r_{22} 的走势基本相反, 特别表现在 1985 年前后和 1997 年前后的波动。这说明了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的冗余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到了城镇非公有制部门。而且在大部分时间段 r_{23} 的值要大于 r_{13} 的值, 说明了城镇非公有制部门主要吸收了来自城镇公有制部门转移过来的劳动力。(2)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城镇公有制部门劳动力流出开始减缓, 这一方面是因为公有制部门(特别是国有部门)在前期的改革中释放了大量的冗员, 另一方面也与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放缓有关系。从图形中我们可以看到从 2006 开始 r_{13} 的值开始高于 r_{23} , 而且 r_{23} 的值下降至 0。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封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这也为城乡分割文献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3) 反观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流动系数 r_{13} 的演变趋势则一直保持较为平稳, 并没有出现与 r_{23} 此消彼长的态势。1995 年之前有平缓的下降趋势, 1995 年之后则缓慢的上升。这说明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两类劳动力市场彼此分割, 两者并不存在严重的冲突或者竞争, 这也与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袁志刚 2006; 钟笑寒 2006; Knight and Yueh 2009; 刘学军、赵耀辉 2009)。



说明: r_{22} 对应左坐标轴, r_{13} 和 r_{23} 对应右坐标轴。

数据来源: 同表 3。

图 2 乡村所有制部门、城镇公有制部门转移到城镇非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占比趋势(部门划分: 三部门 B)

六、六部门计算结果

如果我们想进一步知道农村劳动力到底流向了城镇哪些部门, 城镇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的劳动力到底流向了哪些非公有制部门, 城镇内部劳动力的流动反映了什么样的城镇所有制结构的变迁? 显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更细的计算结果。

(一)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毋庸置疑, 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目的地之一; 在乡镇企业部门衰落之后, 城镇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位开始上升,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我们想知道: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流向了哪些城镇部门? 二是城镇内部各个所有制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反映了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变迁? 显然, 三部门的计算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更细的部门划分, 更详细的计算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样, 我们就从三部门的计算转向六部门的计算。^①

图 3 向我们展示了 1978 - 2010 年的农业部门向各个所有制部门劳动力流出情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1) 农村劳动力主要流向乡镇企业部门、城镇民营经济部门。乡镇企业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乡镇企业部门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绝对主力; 进入 21 世纪, 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 乡镇企业部门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大不如前。在乡镇企业部门劳动力吸纳能力减弱的 21 世纪, 民营经济兴起开始超过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部门。(2) 城镇公有制部门从来都没有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劳动力来说是封闭的。文献中讨论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种种制度障碍, 实际上阻碍农业劳动力进入城镇公有制部门。由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部门联系在一起, 计划经济时代, 城镇公有制部门垄断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业劳动力的封闭, 实际上限制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本身的发展。(3) 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

^①由于篇幅所限, 文章省去了六部门计算的详细结果。有兴趣的读者请向作者索取。

纳非常有限,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城镇现代企业部门主要从城镇公有制部门而不是农业部门吸纳劳动力。(4)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实际上是城市的民营经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很难在城镇公有制部门就业,大多在私营、个体或各种非正式部门寻找出路。这与经典劳动力流动理论的预见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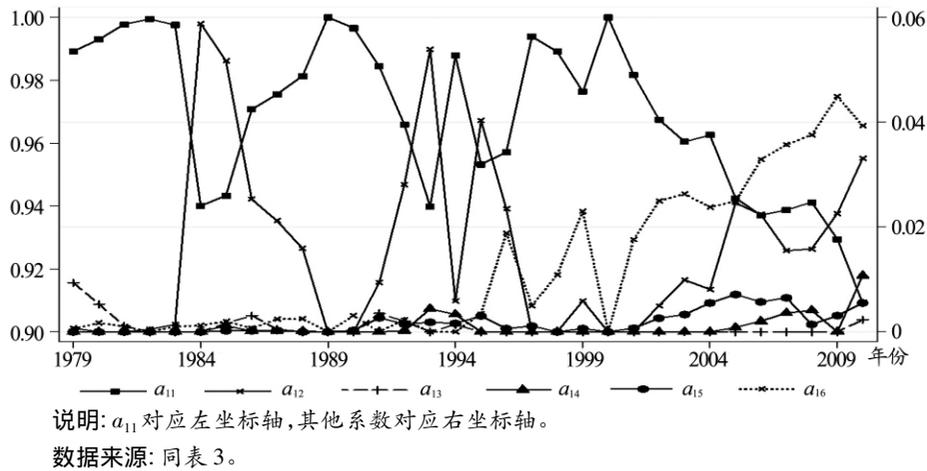


图 3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出(部门划分:六部门)

(二) 城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在城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劳动力从城镇公有制部门流向城镇非公有制部门是主要的流动方向。但是我们想知道,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具体流向了哪些部门?城镇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又反映了城镇所有制结构什么样的变化?

根据六部门详细的计算结果,我们详细列出了吸纳城镇公有制部门流出劳动力的部门(见图 4)。从中我们发现:(1)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主要流动去向是城镇民营经济部门,公有制部门的大量冗员为民营经济的兴起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一点也可以从前面的相关系数判定看出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公有制部门冗员,而且也打破了公有制部门的垄断,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可以在不变换自己产业的情况下转换自己的所有制部门。(2)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和 90 年代末期,公有制部门劳动力的流出出现了高峰。这两个高峰的出现都是大规模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果。当时,大量的城镇公有制劳动力离开了公有制部门,形成劳动力大规模的下岗。(3)城镇现代企业部门是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载体,因此,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也吸纳了大量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冗员。(4)城镇民营经济的诞生和发展意味着城镇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虽然民营经济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是城镇民营经济的兴起则是 90 年代初国有企业大规模改革之后的事情,特别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改革三年攻坚阶段的表现尤为突出。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冗员的过程逐步结束,民营经济的发展所需大量的劳动力主要来自农业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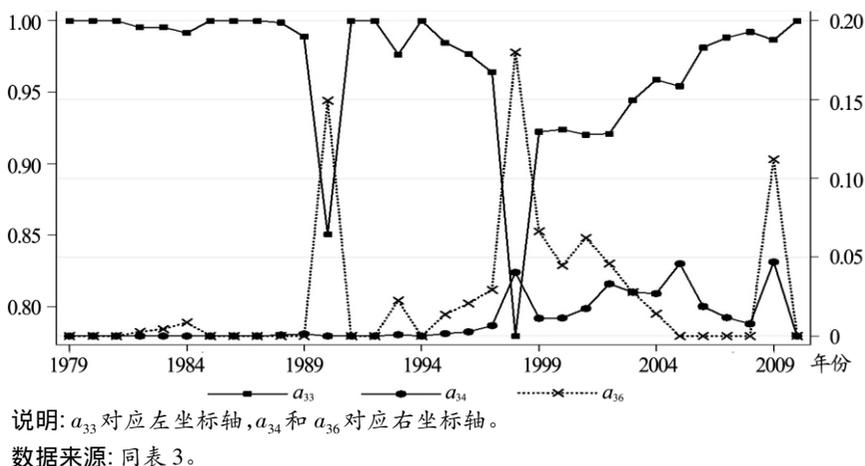


图 4 城镇公有制部门的劳动力流出(部门划分:六部门)

七、结论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指经济结构中的各所有制部门地位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对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系数严谨科学地计算,是我们评估劳动力流动背后所有制结构变迁因素的第一步。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修正后的城乡各种所有制企业就业数据,本文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部门间劳动力流动系数。我们的计算表明:

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但是,城镇公有制部门对农村劳动力都是封闭的,城镇民营经济部门是农村劳动力最主要的吸纳部门。

2. 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起,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衰落,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进入21世纪10年代后半期才缓慢开始上升。

3. 城镇现代企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这一部门主要吸纳了城镇公有制部门释放的劳动力,成为城镇公有制部门冗员的主要流向部门。

4. 城镇公有制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后半期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是进入21世纪,公有制部门改革减缓,劳动力释放越来越少;这一变化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紧密联系。

5. 从计算结果来看,外来投资部门对劳动力的吸纳一直非常有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但是对外经济活动的背后是国内非公有制企业的兴起,并不是依靠外来企业完成的。

劳动力流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迁,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所有制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和的发展趋势。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而劳动力在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流动与中国所有制改革进程紧密联系。

参考文献:

1. 蔡昉 2000 《中国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 蔡昉 2001 《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社会学研究》第4期。
3. 蔡昉 2007 《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经济研究》第7期。
4. 蔡昉 2010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经济研究》第4期。
5. 陈钊、陆铭 2008 《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第1期。
6. 邓曲恒、古斯塔夫森 2007 《中国的永久移民》,《经济研究》第4期。
7. 范剑勇、张雁 2009 《经济地理与地区间工资差异》,《经济研究》第8期。
8. 刘伟、李绍荣 2001 《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经济研究》第1期。
9. 刘学军、赵耀辉 2009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经济学(季刊)》第2期。
10. 农业部课题组 2000 《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5期。
11. 沈坤荣 1999 《改革二十年我国所有制结构变动对产业结构变动的分析》,《管理世界》第2期。
12. 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 2011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第1期。
13. 夏纪军 2004 《人口流动性、公共收入与支出——户籍制度变动因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14. 于立、姜春海 2003 《中国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就业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3期。
15. 袁志刚 2006 《中国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一个经验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16. 周靖祥、何燕 2009 《城镇农村劳动力“吸纳”与区域经济增长实证检验——基于1990-2006年省际所有制变革视角探析》,《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17. 钟宁桦 2011 《农村工业化还能走多远》,《经济研究》第1期。
18. 钟笑寒 2006 《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19. Fujita M., P. Krugman and A. J. Venables.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 Hanson G. H. 2005. "Market Potential, Increasing Returns, an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7(1): 1-24.
21. Knight J., Quheng D., and L. Shi. 2011. "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u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ur Surplu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4SI): 585-600.
22. Knight J. and L. Yueh. 2009. "Segmentation or Competition in China's Urban Labour Market."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3(1): 79-94.
23.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5): 950-959.
24. Lewis W.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22(2): 139-191.
25. Li C. 2010. "Labor Mobility within China: Border Effects on Interregional Wage Differentials." *China & World Economy* 18(2): 60-72.
26. Lucas Jr. R. E. 2004.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1): 29-59.
27. Ranis G. and J. C. H. Fei. 1961.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4): 533-565.
28. Sjaastad L. A. 1962.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5): 80-93.

29. Stark ,O. and D. E. Bloom. 1985.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2) : 173 – 178.
30. Stark ,O. and J. E. Taylor.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 *Economic Journal* , 101(408) : 1163 – 1178.
31. Todaro ,M. P. 1969.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1) : 138 – 148.
32. Todaro ,M. P. 1970.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 Reply.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1) : 187 – 188.
33. Todaro ,M. P. 1980.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 Asia: A Demographic Perspective. "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6(1) : 167 – 168.
34. Zhang ,H. F. 2010. "The Hukou System ' s Constraints on Migrant Workers' Job Mobility in Chinese Cities. "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1) : 51 – 64.
35. Zhao ,Y. H. 2003.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 "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1(4) : 500 – 511.
36. Zhu ,N. 2002. "The Impacts of Income Gaps on Migration Decisions in China. "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2 – 3) : 213 – 230.

The Evolution of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Labor Mobility in China: 1978 – 2010

Dai Qian^{1 2} and Tian Xianghui³

(1 :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Wuhan University; 3: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entral China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has begun to reform and open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non – public sectors. However ,the non – public sectors need a lot of labo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o some extent ,the evolution of ownership structure determines the direction and scale of labor mobility. We calculate the labor mobility coefficient of the rural and urban sectors and then analyzes the labor mobility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ownership structure in economy ,which based o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 employment data corrected by China Population Census 2010. The result shows that: (1) it is private – ownership sectors in town have employed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 ,rather than public sectors; (2) township enterprisers have absorbe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 forces in their booming time ,however ,declined in the 1990s ,then began to rise after 2004; (3) the mobility of redundant labor in public sectors is determined by the reform process of China ' s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Key Words: Labor Mobility Coefficient; Ownership Structure; Rural and Urban Sectors

JEL Classification: C1 ,J60 ,O18

(责任编辑: 彭爽)

(上接第 24 页)

20. Miller ,M. and K. Rock. 1985. "Dividend Policy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 *Journal of Finance* 40(4) : 1031 – 1051.
21. Modigliani ,F. and M. H. Miller. 1958.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e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3) : 261 – 291.
22. Morck ,R.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1988. "Management Ownership and Market Valu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3) : 293 – 315.
23. Motta ,A. D. 2003.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 *Journal of Finance* , 58(3) : 1193 – 1220.
24. Scharfstein ,D. S. ,and J. C. Stein. 2000. "The Dark Side of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Divisional Rent – Seeking and Inefficient Investment. " *Journal of Finance* , 55(6) : 2537 – 2564.
25. Wanniski ,Jude. 1978. *Taxes ,Revenues and the "Laffer Curve"*. Published by The Public Interest.

Insider Contro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Dividend Payout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and Government Revenue

Qian Xuesong and Kong Dongmin

(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paper develops an agency model which introduces the factor of forced dividend payout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We use the model to consider problems of how to set optimal dividend payout ratio and deal with dividend income. The analysis implie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idend income and payout ratio is inverted U – shape.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institution designs. First ,in order to avoid decreasing profits ,the related government institution must have ability and incentive to reinforce corporate governance. Second ,in order to reduce free riding and rent seeking ,dividend income should be disgorged out of state – owned enterprises.

Key Words: Dividend Payout; Insider Control; Corporate Governance

JEL Classification: G35 ,G38 ,P31

(责任编辑: 陈永清)